



石城结构布局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黄河一级支流浑河北岸的坡地之上，面积约138万平方米，距今4300~4500年，是内蒙古地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为严密的龙山时代早期石城。自2019年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为系统实施“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研究，对后城咀石城连续开展了五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基本阐明了其规划布局、建筑技术、文化面貌与防御体系特征。

## 城防体系

后城咀石城平面大体呈椭圆形，由内城、外城以及瓮城组成，长约1200米，宽约1150米，面积达138万平方米。石城北部制高点是进出石城的唯一通道，也是城防体系构筑的核心区域。目前已明确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主城垣、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的与主城垣相接的2座马面构成的第一重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垣、瓮城城垣上布置的4座台基、2座墩台以及与瓮城城垣外侧毗邻的壕沟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外瓮城城墙、城墙两侧马面、台基以及与外瓮城城垣平行布置且与两侧自然冲沟相接的壕沟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

第一、二、三重防御体系分别合而为成“瓮城”和“外瓮城”。此外，随着地下通道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晰认识到后城咀石城的防御体系除地面上已见的“双瓮城与三重防御”结构外，还包括隐藏在地下由多条地道组成的、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络系统。

## 主要遗迹

2019年至2023年考古发掘工作紧密围绕瓮城城门、内城高等级建筑群和墓葬区开展，揭露城垣、城门、马面、台基、壕沟、地下通道、房址、墓葬等一批建筑遗存。

**城垣** 共发现3道城垣，主城垣(Q1)、瓮城城垣(Q2)以及外瓮城城垣(Q3)。其中主城垣(Q1)依山脊走势分布，整体呈“C”形，两端与浑河相接，全长约8.1千米，宽3~5.7米，残高0.8~1米。建筑形制可分为单土石砌和石砌，版筑土墙复合结构两种，其中单土石砌城垣多沿山脊分布，直接用石块层层错缝垒砌而成，缝隙之间填以黄土或碎石；复合结构城垣是在石砌城垣外侧附加版筑土墙而成，土墙多分段分层版筑而成。瓮城城垣(Q2)位于主城门外侧，整体呈弧形，单纯由石块垒砌而成，宽约5.6米。外瓮城城垣(Q3)位于主城门防御体系最外侧，整体呈“Π”形，单纯由红色砂岩垒砌而成，宽1.5~1.9米。

**壕沟** 共发现壕沟2条，其中1号壕沟(G1)环绕于瓮城城垣外侧，宽约6米，深2~7米，至瓮城城门处变窄；2号壕沟(G2)环绕于外瓮城城垣内侧，外瓮城城门通道将其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宽2.4~2.6米、深1.4~2.2米；西段宽2.2米，深3.19米，其内出土大量猪下颌骨、玉器、骨器等。

**地下通道** 共发现地下通道6条，以外瓮城地下空间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通道距地表1.5~6米，高1~2米、宽1~1.5米，顶部皆呈拱形，与龙山时代窑洞建筑工艺特征相近，直壁，壁面挖掘工具痕迹明显。其中三条地下通道从城外开口并依次穿过外瓮城城垣底部、2号壕沟底部、外瓮城广场与1号壕沟东段相接；两条地下通道开口于1号壕沟壁面之上，经瓮城城垣底部与瓮城广场相连；一条地下通道开口于瓮城城门处，穿过瓮城城垣底部通向外瓮城，纵横交错的六条地下通道和两条壕沟共同构成了后城咀石城极具特色的“明沟暗道”式地下交通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城市防御体系的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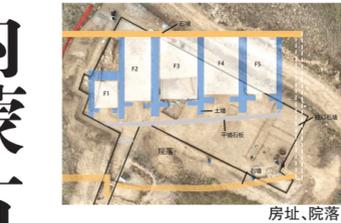
**城门** 共发现城门3座，分别为主城门(CM1)、瓮城城门(CM2)、外瓮城城门(CM3)。主城门位于外城垣中部，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9~11米，由中间的门道、门道两侧的土台基、土台基外侧的城门墙体以及墙垛、柱洞、门槛等构成。城门墙体由大块页岩层层错缝垒筑而成，现存高度约0.3米；土台基紧贴门墙内侧修建，由黄泥土版筑而成，高约0.5米；台基平面之上铺砌一层石板且纵向各分布一排直径约20厘米、深约100厘米的柱洞，柱洞之间间隔约1米；门道位于土台基之间，宽2.7~3.6米，整体呈长方形，笔直宽阔，地面平整且残存大量木构件残迹；门槛位于门道最北侧，与两侧墙体相接，长约3米，宽10~15厘米，深10~20厘米，内部存留大量木炭；门道踏路面及土台基平面、立面、门槛内壁均抹以黄泥，经火烤后呈红色或青灰色。城门出土木炭年代检测为距今4300~4500年。

**马面** 共发现马面4座，均分布于外城城垣外侧，可分为空心 and 实心两种。2号马面(MM2)平面呈长方形，长约9米，宽6~7米，中部空心，中部存一直径约20厘米柱洞，南侧与城垣相接，其余三侧为石块垒砌而成，宽1.3~1.6米、高1~1.5米。

# 发现



出土器物



房址、院落

**高等级建筑群** 位于后城咀石城内城近浑河的一处独立台地的顶部，台地四周纵向分布五道平行的石质护坡墙，顶部平台使用石墙合围成院落。高等级建筑群位于院落中部，坐北朝南，前堂后室五联间结构，墙体夯筑，地面与墙面厚约2厘米的白灰面。建筑群前存石质散水类遗存。

**墓葬** 目前尚未发现大规模成片墓葬，仅在城西南侧发现由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板墓构成的小规模墓地。墓葬均朝向向东，墓底部为平整的板石铺就而成，墓圻四壁则使用板石垒砌而成，单人仰身直肢葬，仅随葬少量石质工具及石环、绿松石及骨笄等随身的饰品。

## 出土遗物

**陶器** 完整器较少，以陶片居多。陶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磨光黑陶为主，并有少量的泥质黑陶、泥质红褐陶和极少量的砂质灰陶。纹饰以篮纹和绳纹居多，见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几何纹、压印纹、戳印纹等。器类主要有鬲、甗、甗、甗、甗、豆等，其中出土的宽裆鬲、敛口瓮等兼具老虎山文化和永兴店文化的双重特征。

**玉器** 出土数量相对较少，多发现于2号壕沟或5号台基附近。器类主要有玉璧、玉铲、玉刀、连璜璧、玉环等，整体器体偏小，玉质较细腻，通体打磨光滑，多为岫岩玉，与陶寺、碧村、石卯、齐家文化出土玉器有较多相同之处。

**石器** 可分为磨制、打制、啄制三类，器类主要有斧、刀、镞、凿、石饼、石核、刮削器、门臼石等。其中斧的形制厚重，截面呈圆角方形，刃部尖锐有疤痕，为本地永兴店文化典型器物。

**骨器** 器类有镞、锥、针笋等，多发现于外瓮城区域的两条壕沟和外城的墓葬内，其中骨锥、骨镞多发现于外瓮城的壕沟内，骨笋出土于墓葬。均为磨制，器型偏小。

## 学术价值与意义

后城咀石城是**目前发现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拥有最为严密、完整、防御体系的石城**。经过五年的持续发掘，现已明确后城咀石城由三重城垣及附属建筑构筑的三重防御体系和双瓮城结构与壕沟、地下通道构筑的“明沟暗道”式地下交通体系共同组成了后城咀石城最为严密、完整的立体城防体系。不同地点、多样本的年代检测结果显示其年代主体介于距今4300~4500年，略早于已发现的石卯、碧村等同类石城，为探索龙山时代石城建筑技术传播、防御体系规划提供了崭新的线索。

后城咀石城是**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中心城址**。河套地区石城可早至庙底沟二期阶段，但规模较小且布局简单；至龙山时代晚期发现的石卯、碧村类石城为学界展现了这一阶段高等级中心城市的历史风貌，而后城咀石城的发现，则恰恰填补了石城发展史上空白，138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极为复杂的防御体系，类似石卯皇城台的高等级建筑台基，与芦山卯“宫城”形制的建筑群，玉璧、玉铲、玉刀等大量玉器的出土，无不昭示出后城咀石城作为龙山时代早期河套地区中心城址的地位。

后城咀石城既是**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融合地**又是**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外传的策源地**。后城咀石城出土的宽裆鬲、敛口瓮、甗等典型陶器既有本地永兴店文化、老虎山文化的特征，又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陶器相似；出土的玉器其种类、材质与石卯、陶寺和齐家文化一致；由石质护坡墙构成的台基，台基上修建的院落、房址，与石卯皇城台、芦山卯“宫城”形制相似；石板墓与本地区的小沙湾、下脑包、西岔墓葬及石卯韩家圪旦地点发现的同类类型墓葬形制一致；直入式的主城门结构与后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北票康家屯城门、商代望京楼东—城1门址、偃师商城西二、三号城1门址的结构特点一致；转折式的人城方式与石卯、碧村等石城入城方式一致，但更早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遗址。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可发现，后城咀石城的文化面貌除延续本地区已有的文化传统外，与晋西、陕北、甘青等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密切且频繁的联系，其特有的建筑技术、规划布局思想等考古学文化也对晋西、陕北乃至中原地区后期考古学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孙金松 党郁 李亚新 徐婷娜 杨佳峰 王泽鹏 高海涛)

2021年至202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都遗址内城东南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即发现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在项目区域内发掘商代墓葬、灰坑、祭祀坑、灰坑、水井等遗迹360余处，出土丰富的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遗物，文化内涵包括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及白家庄期，另有大量唐宋金元等时期文化遗存。

## 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

墓地位于郑州市紫荆山路东、东大街南、书院街北侧，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兆沟内面积3万余平方米，是郑州商都遗址首次发现的时代明确、结构清晰、功能完备的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兆沟** 系人工挖掘。南兆沟G1发端150余米，东段向北转向延伸，西段残缺。北兆沟G5中间残缺，东段发端长45米，西段发端长6米，复原长度140余米并向两端延伸。兆沟经过三次疏浚，经勘探、发掘，兆沟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240米，南北间距约130米，其建造、使用、废弃年代均为商代白家庄期。

**通道Ⅰ** 通道Ⅰ位于南兆沟西段，现宽约2.5米，系借用原第Ⅰ(二里岗上层二期)、Ⅱ(二里岗下层一期)组夯土建筑废弃后的地基建作为进出墓地的地面通道，挖沟时留取一段地基不动，在两侧开挖兆沟。通道Ⅰ南侧残存三个柱洞，应为墓地通道外侧的门房类建筑遗存。

**通道Ⅱ、通道Ⅲ** 位于北兆沟东段，为两处相邻的栈桥式结构。

**通道Ⅱ** 位于T1614内，为沟内载设两排南北向木柱支撑的栈桥结构，经过处沟宽约5米，每排木柱8~9个，两排木柱间距约1.60米。通道北侧残存柱洞8个，为通道外侧相关建筑遗存。

**通道Ⅲ** 位于T1615内，为沟内载设三排东西向木柱支撑的栈桥式结构，每排残存柱洞7~9个，多数柱洞内有柱础石。三排柱洞深入生土层，分布范围东西约8米，南北约3.5米。这两处通道推测为一度兴建的一处，西侧通道Ⅱ毁坏废弃后，在东侧又兴建了一处规模更大的通道Ⅲ。

在通道Ⅱ、Ⅲ的南侧残存路土，东西宽约3米，南北残存约1米，残存厚度0.02~0.06米，应为通向墓地的道路。

**墓葬20座** 均为竖穴土坑墓，近南北向，排列有序，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东部偏北。其中随葬铜器墓葬3座(M2、M24、M30)、普通墓葬17座。

M2位于墓地东部，方向198°。平面长方形，残存底部，墓圻南北长2.6米，东西宽1.1米，残深0.35~0.55米。墓室北部残存胫骨、关节骨，经鉴定葬3人。墓底殉狗坑6处，腰部、头部及四角各1处。随葬品216件，有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 etc,按功能可分为炊器、酒器、容器、兵器等。铜器有鼎、鬲、甗、甗、甗、甗、甗、斗、斝、戈、刀、箭镞、铜覆面等。金器有金覆面、黄金绿松石牌形

夏尔雅玛可布，蒙语意为“黄色山羊出没的河滩”。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昆仑山脉支系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2990米。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

2021年至2023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遗址规模宏大，目前探明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功能区划复杂，主要由居址和墓葬组成。遗址被哈图河横穿而过，被分为西北—东南两个大台地。西北台地处于哈图河西，为单纯墓葬区(A区墓地)；与之隔河相望的东南三角台地为居址区；居址区西南、东南方向还有两片墓葬区(B区、C区墓地)；另外在外国发现零星居址。

## 居址区考古发现

居址区位于东南台地，目前探明面积约10.48万平方米，可分为居址核心区 and 居址边缘区。目前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核心区，边缘区域仅经过勘探和试掘。另在居址外围还发现零星居址。

**居址核心区** 居址核心区位于哈图河与伊克高里河三角交汇台地处，平面呈三角形，南高北低，西侧被哈图河常年冲刷破坏，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掘前地表可见以石块垒砌的两重石构墙体和部分石围建筑。发掘区主要位于内圈石(城)墙中部和东部，发掘总面积约650平方米。

居址核心区地层堆积最厚约3米，初步确认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现重要遗迹有壕沟1条、高台硬面1处、房址7座、瓮棺葬1座。第二阶段发现重要遗迹有土坯墙1堵、木构围栏1座、铜冶铸造废弃堆积1处和少量灰坑、灰沟、火塘等；另外发现6处呈土丘状灰堆，由倾斜坡状堆积层层叠压，夹杂大量炭屑、动物骨骼、陶片等遗物。第三阶段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内圈石(城)墙1座、土堆等。

居址中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牙器、铜器、木器、有机质等遗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

**居址边缘区与外围居址** 居址边缘区域面积约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较薄，最厚不超过1米，勘探调查与试掘仅发现少量灰层、陶片、动物骨骼等，已发掘遗迹以石构建筑为主。

## 墓葬区考古发现

**总体概况** 遗址现已发现三片相对独立墓地(A、B、C三区)，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结合地表踏查、考古勘探、激光雷达扫描、RTK定位，共发现墓葬3228座，已发掘52座。墓葬在地表可见

# 河南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



通道Ⅰ(红线)与Ⅰ组(绿线)、Ⅱ组建筑(白线)关系

饰、金泡、金箔等。玉器有戈、钺、柄形器、猪、鱼等。另有绿松石、箭镞、贝币等。M2是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

M24位于M2东偏北20余米，方向6°。平面长方形，墓口南北长2.52米，东西宽0.9米，深约0.35~0.7米。人骨3具，均头向北，中间人骨为俯身直肢葬，男性，25~30岁；西侧人骨为侧身直肢葬，面向中间人骨，女性，20~23岁；东侧人骨15岁左右，疑为女性，侧身曲姿，面向中间人骨。出土铜器8件，有鼎、鬲、甗、甗、甗、戈等，集中分布在墓室北端，呈毁器葬。另有箭镞、玉瑁、玉蝉形管、陶陶片等。墓底有腰坑，葬狗一只，出土玉珪一个。

M30位于M24北部约12米，方向186°。平面长方形，南北长2.06米，东西宽0.68米，深0.12~0.3米。头南向。出土铜器有爵、斧、斲手、针、铜片以及玉柄形器、石铲、圆陶片等。

**祭祀遗存** 猪坑2座，牛角坑5座，人牲坑2座，另有8座灰坑出土有牛角。祭祀形式有墓底多坑殉狗、腰坑殉狗、沟内祭祀、单牲祭祀、灰坑祭祀等，类型有人牲坑、狗坑、猪坑、牛角坑等。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墓地南兆沟附近东西排列分布6组夯土建筑基址，分为长方形多间排房式和四合院式，建筑时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至白家庄期。

第Ⅰ组建筑为南北向四间排房结构，残存部分夯土墙基槽，南北约16米，东西约6.2米，部分叠压于第Ⅱ组建筑西部之上，时代为二里岗上层二期。

第Ⅱ组建筑结构为四合院式建筑，坐北朝南。北部正房残存版筑夯土基址，近方形，南北约12.5米，东西约12.1米。版筑夯土南面残留8个南北向左右并列柱础坑，为院内的南北向通道。东、西厢房分布于院内通道两侧，残留部分墙基槽，东厢房呈狭长型，西厢房近方形。正房版筑夯土底部铺垫有互相交织的横向、纵向、立向桩木，这些排列有序的木柱类似于现代建筑的柱网式基础，为加强底部夯土的特殊构造，在商代房屋建筑基址中系首次发现。时代为二里岗下层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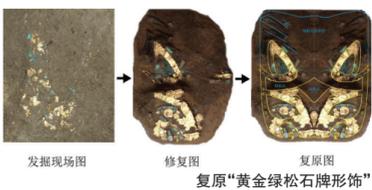
第Ⅲ组建筑位于第Ⅱ组建筑南侧，残存少量墙

## 收获与意义

发现迄今为止西北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为探索西北地区史前埋葬习俗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案例。遗址发现三片相对独立墓地，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发现墓葬3228座，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史前墓葬群。极度盛行的二次扰乱葬，为探讨甘青地区这一重要葬俗的实施细节、发展演变以及人群演变贡献了丰富材料；三片墓地的墓葬规模形态已显示出等级差异，为揭示柴达木盆地乃至青藏高原史前社会分化提供了案例。

遗址汇聚的多元文化因素，为探讨史前农牧文化互动、早期丝绸之路和古代多民族融合进程提供了历史依据。出土的大量动物等遗存显示了畜牧业在诺木洪文化中的重要性，使夏尔雅玛可布成为探讨严酷高原环境中的人地关系的珍贵样本；土坯、红玉髓珠、海贝、彩陶、青铜器、漆器、大麦、粟、牛羊骨骼等遗存，是青海作为早期丝绸之路关键路口的实证，展现了柴达木盆地先中道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见证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渐进式发展和古代多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历史历程。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 执笔:杜玮 郭梦 向金辉 王飞虎 刘展望)



发掘现场图 修复图 复原图 复原“黄金绿松石牌形饰”



M2出土铜甗、盃、盘、甗、爵

基槽、版筑夯土，建筑结构不详，时代为下层一期。

第Ⅳ组建筑结构为东西向排房建筑。残存有墙基槽、柱础坑、室内夯土等遗迹现象，叠压打破第Ⅴ组建筑，南北两侧有门道。整体范围东西长17.9米，南北宽5.6米。时代为白家庄期。

第Ⅴ组建筑结构为四合院式，坐北朝南。残存有柱础坑、墙基槽、室内夯土等遗迹现象。正房三间，东西长14.3米，南北宽5.1米，南北两侧有门道结构。东西厢房，结构残；东房东西3.9米，南北3.2米；西房东西4.9米，南北3.2米。正房北侧有廊庑结构，整体范围东西总宽23.9米，南北7米。时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第Ⅵ组建筑残存部分版筑夯土地基，结构不详，时代为白家庄期。

根据白家庄期建筑(第Ⅳ、Ⅴ组)与墓地的相邻关系、共时性等综合分析，推测建筑与墓地兆域可能存在某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关联。

## 书院街墓地价值与意义

书院街墓地展现了郑州商代王都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商文明演进中表现出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化形态。墓地丧葬礼制规范、文化传承有序并有多项突破性发端，对探讨郑州商都兴衰演变及早期国家礼乐文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的贵族墓地兆域，是殷墟王陵东西并列方兆域的源头。墓地及其附近的同期建筑对探讨兆域起源和中国陵寝制度的发展意义极为重要。

墓地主墓M2随葬铜器组合完整、种类丰富、级别较高，填补了中商早段青铜文化的空白。

M2随葬的扇贝形金覆面、铜覆面组成的覆面礼器组合，从先商、早商墓葬中铜贝壳覆面发展而来，并延续至晚商，是商代贵族特有的一种礼器文化形态，扇贝形覆面器对探讨商族源流等提供了一项新的文化路径。

从金覆面、金泡、黄金绿松石牌形饰等金器的材质、种类、黄金加工技术、绿松石镶嵌工艺，以及黄金文化的本土化表达等方面看，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黄金文明的成熟。

墓地兆域的结构，通道的设置，墓葬的分布，殉狗等祭祀形式，以及铜器、玉器、黄金礼器组合等方面表明，在中商早期，作为早期王权国家礼乐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贵族丧葬礼制已成成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黄富成 侯新佳 吴倩 信应君 姜楠 刘彦锋)

坟墓，长约2米，宽1.5米，仅有一重木椁，较之A区墓葬规模明显偏小，但亦为二次扰乱葬。仅随葬少量陶器、青铜器和树皮制品。

**C区墓地** 位于居址核心区东南二级台地上，面积2.57万平方米。勘探确认C区墓地共有墓葬163座，石围直径也不超过5米，2023年发掘3座。发掘墓葬均为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石椁墓，皆为二次葬，随葬器物很少，仅见有少量陶器和树皮制品。

公共前二千年后半叶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已知规模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该遗址的发掘也是继塔里木里哈遗址试掘后七十多年来对诺木洪文化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诺木洪文化的内涵，实证了柴达木盆地3000年文明史，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关键例证，其具体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次揭露柴达木盆地面积最大、功能完备的史前大型聚落，为全面研究诺木洪文化面貌、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计经济、手工业技术等提供了丰富材料。该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聚落，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发掘确认居址区堆积可分三个阶段，揭露了石(城)墙、房屋建筑(木构围栏、石砌墙体建筑、土坯墙)、(铜)冶铸造遗存等；墓葬类型有竖穴土坑墓、石椁墓、瓮棺等各类遗迹；显示出遗址复杂的形成过程和鲜明的聚落功能规划，尤其是(铜)冶铸造存堆积的发现，对于了解西北地区青铜冶铸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迄今为止西北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为探索西北地区史前埋葬习俗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案例。遗址发现三片相对独立墓地，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发现墓葬3228座，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史前墓葬群。极度盛行的二次扰乱葬，为探讨甘青地区这一重要葬俗的实施细节、发展演变以及人群演变贡献了丰富材料；三片墓地的墓葬规模形态已显示出等级差异，为揭示柴达木盆地乃至青藏高原史前社会分化提供了案例。

遗址汇聚的多元文化因素，为探讨史前农牧文化互动、早期丝绸之路和古代多民族融合进程提供了历史依据。出土的大量动物等遗存显示了畜牧业在诺木洪文化中的重要性，使夏尔雅玛可布成为探讨严酷高原环境中的人地关系的珍贵样本；土坯、红玉髓珠、海贝、彩陶、青铜器、漆器、大麦、粟、牛羊骨骼等遗存，是青海作为早期丝绸之路关键路口的实证，展现了柴达木盆地先中道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见证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渐进式发展和古代多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历史历程。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 执笔:杜玮 郭梦 向金辉 王飞虎 刘展望)